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From Politics to Reason of State

从善的政治到国家理由

[意]莫瑞兹奥·维罗里◆著

郑红◆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From Politics to Reason of State

从善的政治到国家理由

[意] 莫瑞兹奥·维罗里 ◆ 著
郑 红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善的政治到国家理由 / (意)维罗里著;郑红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8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6971-0

I. ①从…

II. ①维… ②郑…

III. ①国家理论—研究

IV. ①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3475 号

从善的政治到国家理由

著 者:(意)莫瑞兹奥·维罗里 译 者:郑 红

责任编辑:郭 威 丁 昊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19.5 字数:28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6971-0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实录》（10卷）、《北大哲学门》（10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卷）、《楚辞源流选集》（5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本）、《绿色经典文库》（16本）、《大美译丛》（8本）、《支点丛书》（10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



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10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60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60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30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20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80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80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80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年9月28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目 录

介 绍	001
第一章 政治话语的重现	010
第二章 城市和政治人的哲学	075
第三章 马基雅维里与共和政治观	134
第四章 弗朗西斯科·圭恰蒂尼：在政治和权术之间	186
第五章 公民哲学的余晖	208
第六章 国家理由的胜利	244
跋：作为公民哲学的政治	286
译后记	301



介 绍

在公元 16 世纪和 17 世纪之交，政治话语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转变，堪称“政治学革命”，尽管“革命”这个词听起来有些夸张。像所有重大的革命一样，这场革命波及全欧洲，而且广泛地涉及思想和道德领域。不仅“政治”这个概念的含义和使用范围发生了变化，而且政治学的地位、政治教育的作用和有关政治自由的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这场革命导致了“政治”地位的贬损。在这之前的 3 个世纪里，政治一直被供奉在人类科学中最高尚的位置。从这场革命开始，政治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卑鄙、堕落和肮脏的行为：它不再是反击腐败的利器，而是相反，成为与腐败沆瀣一气的伎俩。

尽管这场“政治学革命”能量巨大，但是却很少受到关注。本书试图填补思想史中的这段空白。本书的研究起始于 13 世纪，那时，在意大利重现了一套被普遍认可的政治话语；终止于 17 世纪，那时，政治成为国家理由的同义词。有一点要明确，即，在整个 17 世纪，学者们仍然继续力图恢复古典的观念——政治是建立好政府的高尚艺术。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能够击败国家理由，也没有能够阻止将政治降格为建立好政府的手段。

在一定程度上，本书的时间断代和地理边界是粗略的。如果能讲述当时不同的政治情势和国家理由，那么无疑是更有趣的。比如，可以从柏拉图对比哲学王和暴君开始，沿着权力政治观（Realpolitik）与伦理政治观的争论，一直延伸到现当代的讨论。^[1]除了意大利，历史学家还可以研究法国、英国、西班牙和德国。这些研究可以使本书的研究对象更



加有趣和丰满。

然而，我认为，将研究时段选定在 13 世纪至 17 世纪是有历史依据的。我们已经有充足的材料证明：13 世纪的哲学家和学者已经认识到，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酝酿着一种新科学和一套新话语。尽管有史料记载，12 世纪时有学生抱怨缺乏一种用来阐述政治善的科学，但是，圭万尼·维拉尼（Giovanni Villani）曾记录了布尼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用来教导佛罗伦萨人的政治原则。3 个世纪以后，学者们或是遗憾或是赞同地承认，一场重大的转变已经发生了：政治不再指代依照正义和理性来统治共和国的艺术（这是对布尼托·拉蒂尼的政治概念的解释），而是指代国家理由——保持对人民行使统治的手段。后来，以国家理由为内容的新政治观在日常话语中传播开来：在拉蒂尼的传统解释之后，从 1705 年版的 *Vocabolario degli Accademici della Crusca* 中，我们可以读到，政治也意味着“国家理由和法律的统治（ragione di stato, jus regni）”。尽管在传统的政治观——政治是关于好政府的艺术——和以国家理由为内容的政治观之间一直存在着差别，但是，17 世纪的确是一个转折点。我认为，无论是从历史重要性上还是它对我们当今政治话语的影响上，这一时期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在这本书中，我首先追溯了这套新政治话语的三个来源：政治美德的传统、罗马法和亚里士多德主义。接下来，我探究了思想和观念上的转变，即政治话语从好政府的艺术到国家理由的转变。我强调指出，国家理由这套政治话语的胜利是伴随着曾在 13 世纪中期流行的那套话语的隐匿，它曾在公民人文主义的时代被发扬光大。

我们已经习惯将“政治”这个标签贴在任何一种政府实践、立法和司法形式之上。但是，对于我这本书的读者而言，政治不仅仅是一种立法、统治和行使司法权力的方式。我要力图区分两种政治：一种是指维护共和国存在的艺术，而共和国意味着是以正义为原则团结起来的共同体；另外一种是指国家的技巧——维护国家存在的技巧和手段，这里的国家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权力，它掌控着公共机构（例如美第奇家

族的统治 *stato*)。毫无疑问,国家这个概念也被用于普遍意义上的统治,那么也包括共和国这种特定的统治形式。然而,尽管如上的论述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在君主统治和共和国统治之间的区别构成了近代早期意大利政治话语的基本内容。“国家 (*stato*)”和“共和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彼此互相排斥的概念,如果我们要理解前述这一点,我们就得像惯常的做法那样,将我们的思维习惯和定势抛开。如果某个公民组建了他自己的党羽,并且控制了政府和官员,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再被认为是属于全体公民的共和国,而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国家——国家的技巧由此就产生了,而不再是政治的艺术。国家的技巧和共和国的艺术致力于建立和维护两种不同的公共生活。在本书中,我希望阐明的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技巧是政治艺术的对立物,也是国家理由的前身。

拉蒂尼的 *livres dou Tresor* (1266年)和波特若 (*Botero*)的《论国家理由》(*Della Ragion di Stato*, 1586年)被看做是思想史发展上的两个重要里程碑。由拉蒂尼阐述的政治含义直到16世纪一直占据着传统政治话语的核心;由波特若创制的国家理由的定义后来成为新政治话语的核心。两种界定——一种将政治视为对共和国进行管理的艺术,这种管理要依据正义和理性;另一种将国家理由视为关于手段的知识和理解,这些手段是用来维持和扩大国家——很明显地揭示了两种方案的差别,这种差别既涉及目标又涉及手段。政治的着眼点是共和国;国家理由的着眼点是国家,不考虑它的起源和合法性。政治的目标必须通过正义和理性来实现;国家理由的目的可以通过采用任何手段来实现。

拉蒂尼和波特若的论述中都出现了“理性 (*reason*)”这个词,但是,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毋宁说,它们标志着另外一项重要的区别。在政治的含义中,“理性”指代西塞罗的理性——*the recta ratio*——体现公正的某些普世原则,我们在立法、商讨和管理等公共活动中的决策必须遵循这些原则。在国家理由中,“理性”是从工具意义上而言的,意味着权衡各种保卫国家的手段的能力。当然,政治的拥护者和国家理由的支持者都赞扬经世之道 (*prudence*),将其看做统治者的一项基本美德。





但是，对于前者而言，经世之道被理解为 *recta ratio in agibilium*，因此，永远与正义紧密相连。对于后者，经世之道是一种决策的能力，决定何种手段是维护国家的最佳手段。卢杜维科·祖柯鲁（Ludovico Zuccolo）是当时最有洞见的国家理由学派理论家之一，曾指出，人们可以谈论暴君的经世之道；但是，公民人文主义者绝不会同意如下的说法：暴君可能是狡猾的或阴险的，但那也是经世之道。

政治的话语与国家理由的话语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但是，从政治到国家理由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是一场政治学领域里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深刻变革。由此引发的不仅是词汇的改变。的确，这是一个措词的问题，但是，这些词语被用来维护或谴责现实中的政治实践。整个过程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改变了惯常用来解释和评价政治活动的普遍方式。

如果认为在国家理由胜利之前，政治行为一直是善的，统治者、王公大臣和公民只是致力于实现公共的善业，那么，这种想法是幼稚无知的。布尼托·拉蒂尼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政治学者作为修辞学家，刻意地颂扬政治的含义。他们在著作中致力于劝说读者去追求一种值得称颂的理想。那些以国家技巧和国家理由为论题进行写作的学者则是致力于描绘现实的政治生活。由此，可以推断出，从政治到国家理由的转变是从政治修辞到政治现实主义视角的转变。谁能够刻板地否认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或圭恰蒂尼（Guicciardini）的《佛罗伦萨政体的对话》（*Dialogo del reggimento de Firenze*）在哲学和思想方面是对帕密尔瑞（Palmieri）的 *Vita Civile* 和布鲁尼（Bruni）的 *Laudatio Florentinae Urbis* 的巨大改进？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国家理由学派的理论家像人文主义的修辞学者一样，也是致力于创建、维系和支持某些政治行为的特定话语。由此，不能错误地认为，政治和国家理由的区别就是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的区别。在历史上，这两种学说之间的区别是被用来支持某些政治实践，以及谴责另外的政治行为。最明显的例子是，国家理由的支持者无一例外地都认同和支持将官职和钱财分配给国王的亲朋。相比之下，将政治视为共和国艺术的学者都谴责如上的行为是最腐败的。

现实中的历史和生活远比概念界定要复杂得多，政治和国家理由的概念正是体现出了这一点。两者有区别，也有联系。正如共和国也是国家，政治有时也与国家理由有交叠的部分。如果共和国也占据一块领土，那么它也是一个国家，与其他的国家和它们的附属国并立，就像佛罗伦萨那样。而且，权力结构是建立在施行强制力的机构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共和国也是国家。共和国的代表们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处理臣属关系或叛乱时，可以明确地感觉自己是“不得不（necessitated）”使用与国家理由无二的手段：用非正义的手段应对非正义的战争，严厉地对待臣属，残酷地镇压叛乱。马基雅维里和圭恰蒂尼，文艺复兴时期最敏锐的理论家，明确地阐述出统治者必须具备政治之善和国家理由两点。

然而，政治和国家理由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交叠并没有改变如下的事实：这两种思想体系在当时的意大利是水火不容的敌人，尽管它们偶尔会带着兴趣甚至好奇审视对方。两者不共戴天：要么是全体人民的城市共和国，要么是某个人的君主国。

在意大利，君主国成为现实。自由的城市共和国被君主国和暴政取代，政治之善的话语被国家理由的言辞排挤。这种转变是完全的替代：政治之善的话语逐渐过时。那么，在君主国或者在暴政统治中，使用国家理由这套话语的意义是什么？君主和臣下都没有充足的理由。统治者和他们的幕僚们，以及学者们都开始公开使用国家技巧（国家理由的前身——译者）的话语，逐渐替代了对政治之善的言说。起初，国家技巧被看做是次等的实践，但是，到16世纪末期，它取得了令人尊敬的地位，被认可为“新政治学”，后来简化为“政治学”。

我的论题只局限在意大利，而且聚焦于特定的问题。我既不打算使用全世界的视角，也无意涵盖意大利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晚期的所有思想史。现有的学术研究条件使我们能够充分理解从政治之善到国家理由这一过渡的阶段，还可以翔实地了解近代早期意大利的主要政治思想家。但是，在我看来，从共和国艺术到国家理由——两种政治观——在思想和智识上的转变还没有被充分论述。像惯常的历史发展那样，结果的产



生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当事者的意图的，而正是这些当事者事实上促成了结果的发生。当圭恰蒂尼在《佛罗伦萨政体的对话》（Dialogo del reggimento de Firenze）中引入国家理由这个概念时，他的意图是告诫西塞罗学说的信奉者：正义不足以维护共和国的存在。然而，他用一个概念确定了先前就存在的某些观念和实践。后来，这个概念很快就成为新政治观念的核心。马基雅维里将 politico 这个词只用于指代共和国的艺术，而让其与国家理由无涉，这样，他反而保留了政治的传统共和含义。他是否是有意这样做，我们不得而知。而且，这一点也无关紧要。问题的关键是，他用不同的词汇来论述政治之善和国家技巧，而且始终如一地使用着两者。

我认为，从政治之善到国家理由的转变是一段重要的历史，它使我们重新思考某些关于现代政治话语起源和转变的传统说法，比如，现代政治开始于 13 世纪后半期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著作的重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版《政治学》扩散和传播之前，西塞罗的政治美德传统和罗马人的“公民智慧（civil wisdom）”已经为一套被广泛认可的政治话语提供了主要词汇。甚至在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主体重现之后，西塞罗的传统和罗马的公民哲学仍然是传统政治观念的主要组成部分。

我们还得重新思考当时的情况——这也是常识——15 世纪首先是一个杂糅（querelle）的世纪，既有公民人文主义者也有崇尚禁欲和独居生活的人，既有歌颂公共生活的吟游诗人也有批判家。所有这些都是事实。然而，除此之外，15 世纪还经历了国家理由——作为实践和理论——的提升，后来，它代替了政治之善的传统话语。共和国和国家的差别是当时思想谱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其重要性不亚于有文献翔实记载的两种生活方式——活跃的公共生活和个人的沉思冥想。

对于理解国家理由的历史含义而言，政治之善和国家艺术的区别是相当重要的。创造这个新词汇的意义何在？它所维护的政治实践是什么类型的？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得考察当时传统的政治话语，把焦点集中在如下的事实上：政治之善把持着对理性的垄断。具体而言，



正义地统治、颁布正义之法、创制和维护善的政治体制，所有这些被看做是理性最有创见的成就。国家理由的实践不具有理性的合法性。鉴于政治之善和理性的统一性，为国家理由寻求合法性的唯一途径就是创造另外一种理性，并且，力证它是不能被忽视的。发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不公正地对待公民，将公共制度用于个人目的——所有这些实践在政治之善的话语体系里都是与理性背道而驰的——通过国家理由的新观念，都获得了某种合法性。它们不再是践踏理性的原则，而是以新的理性观念——国家理性——为依据而实现的政治成就。

如果我们仅仅是研究国家理由这个现代观念的罗马近义词（*ratio publicae utilitatis, ratio necessitatis*），那么，就不能理解它的诞生。尽管词形是类似的，但是，含义不同。如果要理解圭恰蒂尼所讲的国家理由，就得研究当时公民哲学的传统话语。他使用“诸国家的理由（*reason of the states*）”这个特定词汇来指出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的软肋，即，理性之善只在于正义的统治、制定正义之法和维护有序的政制。圭恰蒂尼在《佛罗伦萨政体的对话》中借主人翁之口，批判了传统政治话语，宣扬了实践的必要性，而这种实践在当时被认为是与理性相悖的。最终，他力图论证国家——单纯暴力的产物——的合法性，力图为国家理由的手段争得认可。

与传统政治话语相伴，国家理由的话语也经历了发展和演变。从圭恰蒂尼的创建到波特若的界定，其间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圭恰蒂尼曾明确指出，所有国家的起源都是非法的（除了共和国，在严格的意义上它是公民的共同体）；波特若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一种事实。从国家理由的角度来看，国家无所谓是合法还是非法。这样，国家的概念就从否定性的消极含义中被解救出来，这种含义在公民哲学占据话语统治权的时期一直是对国家的基本解释。国家被赋予了自己的理性，也就取得了可敬的地位。最终，它是力量的理性，这种力量来自能够建立和维护国家的强人，这种理性可能不如政治之善的理性光彩夺目，但是，它必定是更强有力的。



无论是传统的政治之善的话语还是国家理由的论述都是出自诸多思想家之手，当然，有些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留下了更深的印记。在讨论他们的著作时，我的主要目的是探求他们如何促成了现代政治观念的形成，或者说，国家理由这套政治话语是如何兴起。

例如，布尼托·拉蒂尼是本论题的重要人物，他是政治之善思想的集大成者，这套观念产生于关于政治美德的传统和罗马的“公民智慧”。他的学生但丁扩展了这种政治观，使正义统治的艺术扩展为建立和维护政治体制的技巧，由此，总结了由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重现所引发的主要创新。

乌巴迪斯的巴尔杜斯（Baldus of Ubaldis）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论述了城市共和国的技巧。他将政治看做“公民学科（civil discipline）”和正义科学，由此，延续了罗马的公民哲学传统，为人文主义者将政治等同于立法铺平了道路。

克鲁克奥·萨鲁塔蒂（Coluccio Salutati）尽管在思想脉络上不是很清晰，但是他对政治进行了人文主义的阐释。他将政治视为人类理性的最充分的体现，这种理性本身就能创建一种状态，使人们能在其中享有公共幸福。后来的人文主义者，如里昂·巴提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和伯格奥·布莱克理尼（Poggio Bracciolini）敏锐地观察到了国家技巧的逐渐凸现和政治之善的渐退。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作为最明显的例证，论述了国家技巧——他对这个词有明确的理解，而不是政治之善。而且，如果我们研究他的全部政治著作，就会发现他是共和国艺术那种传统政治观念的最笃定捍卫者之一，并不是像其被普遍认可的那样，是国家理由思想的精神教父。另外一位著名的学者是弗朗西斯科·圭恰蒂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他赞成将共和国艺术和国家技巧合并，如他的朋友马基雅维里那样。他还支持对国家技巧进行常规化的解释。与马基雅维里相比，圭恰蒂尼更适合被看做是过渡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终生保留着对公民共和的热爱，但是，他也是国家理由思想的创造者。



多纳托·加诺提 (Donato Giannotti) 并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古典理论的教条模仿者，而是一位有见地的思想家。他力图证明，共和国艺术可以在稳定和秩序这两个领域成功地击败国家理由，而这两个领域恰恰就是国家理由取得最辉煌胜利的战场。他的着眼点是对国家技巧进行修正，使其成为一个具体的政治项目。特若加诺·博卡利尼 (Trajano Boccalini) 不仅仅是反宗教改革的讽刺者，而且也是一位敏锐的学者。尽管有些不情愿，但是，他还是认识到，政治已经具有国家理由的意味。他也理解这一过程所暗含的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

当这一过程完成时，公民哲学不再是政治话语的主流，而是成为某种带有怀旧情怀或乌托邦意味的话语——这套话语倾向于追忆逝去的共和国或憧憬未来的共和国。同时，国家理由的话语一步步地取得主导性的话语权。它成为王公献策派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赢得了令人尊敬的称谓。“国家理由”后来成为政治经世之道的同义语。但是，这种经世之道与正义和法律无涉，与古典的政治观迥异。从城市共和国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政治观是法律和伦理的子嗣；君主和暴政时代的政治与前两者处于对抗状态。

我希望，我力图重构的历史演进过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代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我还希望，对历史的研究能有助于对政治理论的详细阐述，这套理论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政治，使我们能型塑一种值得我们全力投入的政治观念。在“结束语”中，我尝试着提出某些建议，希望这些建议能为当今的政治学理论提供新的视角。那些只对思想演进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忽略“结束语”；那些对理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忽略历史的演进。我个人的偏好是将理论根植于历史之中。

注 释

[1] 这个提议是诺布托·波比奥 (Norberto Bobbio) 和米开朗基罗·博文若 (Michelangelo Bovero) 在 1990 年 12 月 21 日的都灵研讨会上提出的。我非常感谢他们的评论。

